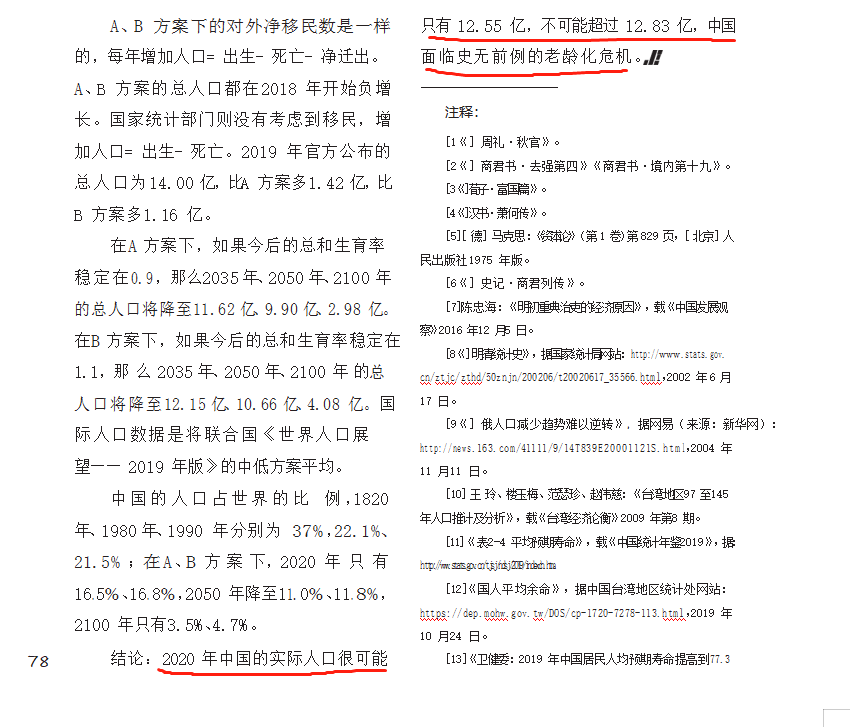
#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 可能会带来的冲击

【内容摘要】：自从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开始全面实施以来，给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到本文写作时间为止，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本来应该是在4月上旬公布，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公布（2021年4月26日），笔者猜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给中国上层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本文将结合易富贤在2020年的论文《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一文，对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整个中国可能带来的冲击进行一番推论。

【作者简介】：赫广达，现年42岁，现居天津，幼儿园大班毕业，现在小商贩，经营一个淘宝网店的同时，经营一个微信公众号“从大地到星辰”。

## 总论

根据易富贤在《2020年人口普查仿真分析》中的最终结论：

中国2020年中国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12.55亿，不会超过12.83亿。与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通过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1月18日公布的中国人口突破14亿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作者并非人口学家或者统计学家，所对这两个数据不予评论，在这篇文章里，主要研究这两组数据产生的落差的原因，以及这种数据落差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中国政府在应对这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可能采取的方法。

总体来说，笔者根据生活经验、日常观察认为中国当下的生育率很可能是在1以下的，也就是平均一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达不到1个。所以，笔者在易富贤所给出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计划生育协会给出的数据之间，更倾向于认同易富贤的数据。以下的分析，笔者也会更倾向于建立在易富贤所给出的数据上进行分析。

上次笔者的文章《别人不说我来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什么还不公布》中，笔者参考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认为中国政府上层已经拿到手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上层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对可能引发的争论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这次这篇文章，就抛开央行的视角，从中国国内其他部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社会等等其他方面的视角，来对中国当下的人口现状产生的问题，进行视野所能及之内的阐述和研究。

## 系统性腐败

易富贤在其论文中，提到了社会各个部门和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伪造人口数据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2008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覆盖全国以来，个人、医院、管理机构续报活产数以冒领医疗经费。
2. 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多报中小学生人数，以套取教育经费。
3. 一些家长给孩子购买额外的出生证以便获得多个户口。

这些个人以及社会部门进行这些弄虚作假的行为，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个人或者部门的利益。而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人口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易富贤用一句话来总结了这种统计上的注水行为：**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

按照现在的易富贤的数据中国当下人口最高不会超过12.83亿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亿人口数据之间，一亿以上人口统计差距，实际上证明了中国现在存在这巨大的系统性腐败。

对于腐败，现在有很多种方面可以来解读，有制度性腐败，有官僚腐败，最近十年来，中国国内很严厉的搞反腐甚至出现了“塌方性腐败”的称谓，但是对于系统性腐败国内政治领域内还是很少有人研究的。

可以看到各种医疗部门虚报病人住院、医疗情况来套取医保资金的腐败行为，也可以看到各种教育部门虚报上学读书的中小学生的数量来套取教育资金的腐败行为。

这些腐败行为，实际上都是系统性腐败的一种表现。

某些学术人士，如此定义系统性腐败：是指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只有通过机制腐败与潜规则才能维持社会的有效运转的现象。

在这里可以修改一下，那就是在一个社会部门中，只有通过机制腐败与潜规则才能维持社会部门的有效运转的现象。

这种系统性腐败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同样存在于美国，比如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次贷危机的产生、酝酿、爆发的过程里扮演了非常负面的角色。

主要是将一些不够等级的房贷债券，通过评级运作，包装成为优质的次级贷债券，并且利用自己的评级机构的长期以来的信用为这些垃圾次级贷债券进行背书，对市场以及投资者的判断造成严重的误导。

中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系统腐败，就体现在不同部门利用自己取得数据的第一手控制的权力，为套取、骗取更多的中央的拨款。各种捏造、修饰人口数据上。

而且，根据笔者的观察，这种医疗、教育、公安等等部门为各自的部门利益以及掌握权力的人的私人利益，搞这种系统性腐败的行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

这也就成为了当下中国国家统计局迟迟不肯公布七普数据的根本原因——七普数据会揭开全国几乎所有地方政府各种系统性腐败的盖子。

说得严重一点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公布之后，就会动摇所有这些地方政府实权机构的存在基础。更严重一点儿的：**动摇国基。**

系统性腐败在中国如此普遍，如此深入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人治。很多人都认为人治社会是一种唯上的社会。也就是上层的人对下层的人拥有权力，下层的人对上层的人有负责的义务。但是实际上，人治社会里的真正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的所有人都是拥有权力的，而这种权力是可以用来交换的。

最简单的说，在一所学校里，校长当然对教师拥有权力，但是教师同样也拥有权力。权力的架构从来都是双向的，教师与教师之间也同样有权力，教师与教师之间同样有权力和义务之间的双向存在。简而言之，整个系统，并不像是一座金字塔，而是一张巨大的网。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网上的节点。

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这张网的利益组成部分，那么对于整个这张网来说，行为逻辑自然不是从上到下的，也不会是从下到上的。而是一种混沌的，纠结的状态。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明规则就会失去现实的作用，潜规则会它替代明规则的位置发挥作用。

曾经有体制内的朋友跟我说：最近几年的反腐结果之一，就是体制内的人，普遍懂得要服从上级，而不是在接收到任何指令之后，会被各种势力所干扰，比如退休老领导，兄弟单位等等的利益集团的干扰。

但是这样明显不够。

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在任期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向法案。

大意为：任何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包括军人在内，不得以上级命令为由推卸其工作中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所有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中第一要向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负责。而非对上级负责。

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内部工作人员，都是向上级负责。不同的行政层级向不同的党委、党组负责。行政工作内部不存在什么法律意识。

各个地方政府的党组织常委会，成为实际上地方政府的决策方式。而这种决策经常是不受法律所控制的。

比如在2020年11月4日，贵州一女子在微信群内骂社区支书是“草包”，对方报警后，她被跨市铐走拘留3日。警察的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但是警察在接到指令之后就这么干了。归根到底，就是警察的行为放手，受到潜规则的支配要强于明规则的支配。

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现任组长是学习。公开声称：“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小组的工作成果如何，大家想必可以根据现实来作出判断。

系统性腐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今天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封建化现状。

医疗、教育、民政等各个社会-政府部门封建化。各自搞各自的一块，在人口统计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个部门根据各自部门的利益来编辑各自的人口统计数据。

很多人都将封建化，理解为一种上级对下级的人身依附制度，将各个社会层级进行简单的横向分割。并没有注意到封建社会同样存在着社会的纵向分割。

今天世界范围内，封建化社会表现的最重的社会是印度社会。很多人都对印度的重型社会的认识，都局限于几大层级种姓的社会结构。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一张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瓦尔那等级：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但是实际上在几大种姓内部，还存在根据不同的职业分割的小种姓。在印度刚刚独立之后的1948年，印度内部做过一个统计，印度内部一共有一千多个种姓。比如有专门做铁匠的种姓，专门做渔夫的种姓，专门做皮革的种姓。

横向的阶层分割与纵向的职业分割相结合，形成了严密的种姓框架，构建成为了印度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在这方面，另外一个有着严重的封建传统的国家——日本，也是有着非常相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日本“工匠精神”，这种工匠精神的执着者，往往是几代人从事同一个职业，累世传承。所以日本的社会价格也是超稳定的。

在中国的行政体制内，有条条块块之分。“条条块块”管理,是指纵向（中央-〉省-〉市）与横向（地方政府）的两种方式管理。这样说似乎不好明白，用一个例子来说。

譬如省气象局，在业务上，它要接受国家气象局的领导和管理，这叫条条管理，但在干部、组织上，它要接受所在地省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这叫块块管理。

但是在块块与块块之间的对接，基本上是严重的割据。

体现在人口统计上，就是当一个孕妇产生之后，当地的公共医学部门开始介入；孕妇生产的时候，妇产科、儿科的医学部门开始介入，来保障优生、优育；生产之后，公共医学部门、公安户籍部门要介入，来进行疫苗注射、户籍登记等工作；幼儿长大成为少年之后，公共教育部门需要介入，履行义务教育法，保障少年的法定受教育权利。

但是在当下的中国，公共医学部门，包括免疫部门，产检与公安户籍部门与公共教育部门之间的数据衔接是不存在的。相信很多宝爸、宝马都经历过孩子出世之后，去派出所报户口的事情。这些部门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通过孩子的亲属来衔接的。各个部门之间得相互协作，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比如武汉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下，其他的时候是不存在的。

这就给了公共医学部门、公安户籍部门、公共教育部门等等各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对人口数据进行编辑的空间。类似的情况，在公安、检查、法院、监狱等等体系里同样存在。

2019年4月爆出来的孙小果案件，从行政上讲，就有这种块块与块块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的原因存在。

同样的情况，在各个城市的水务、能源、交通等各种领域里都是存在的。

## 三，财政供养人员比失衡。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是指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职人员，涉及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仅指政府机关人员，又称国家公务员，以及在服役中的军人。

广义的财政供养人员，又称公职人员，在国外称政府雇员，不仅包括政府机关人员，还包括由财政供养的公共机构人员，如公立机构地教师、医生、环境卫生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等，相当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人员。

按照权威的统计方法，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政府机关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人员、政党机关人员和社会团体机关人员；二是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三是军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公开过一次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总数，在3946万人左右。

2009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2008年年末总人口为132802万人。

按照这个数字，财政供养比为0.0297。

从2005年之后，中国再没有公布过财政供养人员的总数，以及财政供养比数字。

但是在2016年，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声称：“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示： 2016年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8271万人。

财政供养比达到了0.0506，也就是二十五个人供养一个吃财政的。

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吃财政饭，具体的情况因为缺乏第一手数据，笔者无法得知。

但是中央政府最近几年多次公开强调，要限制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可见事情并不乐观。

而且财政供养人员，因为统计口径的差距，有非常大的弹性空间。

在各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内部都存在大量的编外人员。长期以来，在庞大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中，有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群体：编外人员。他们遍布政府机关、法院、检察院、媒体、学校等单位，以科教文卫领域的事业单位中人数为最多。

比如现在全国范围公安系统内普遍存在的辅警群体。具体数量从未有过公开的统计结果。笔者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探寻。

而且财政供养比例在不同的地区内存在着非常不均衡的现象。总体来说，越是不发达、落后的地区，财政供养比例反而越高。

202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建议优化县级行政区划，她说，撤并小县条件已经成熟。越是人口规模小、经济欠发达的县人口流失越严重。西部某省52%的县人口流失。县级行政区划需设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公检法司等机构和社会组织，配套建设办公场所等基础设施。

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为1：5。她的建议是推进小县合并试点，对人口规模低于10万人的小县先行合并试点，减少行政资源浪费，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冯军旗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后写出来了博士毕业论文《中县干部》。其中披露，一个县科级、副科级以上干部，有一千人以上。

假设2020年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维持在2016年周天勇所说的7000万人的数字。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公布的中国人口14亿总人口的数据不变。

那么今天的中国财政供养比是在0.05左右。

加入易富贤在其论文中论证的中国人口最高只可能有12.83亿，那么中国的财政供养比是在0.054左右。

也就是说，中国的普通人民，包括老人、少年儿童等脱产者在内，平均不到二十个人，来养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

更可怕的是财政供养人员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吃空饷”现象。

2014年全国范围内整治吃空饷的现象，其中河南省清理吃空饷人员15022人；河北清退55793人；贵州清退1925人；四川清退28466人。

县级“吃空饷”人员占清理范围人员比例达1.33%，这意味着1万个属于清理范围的人员中就有133个“吃空饷”人员，经济状况较差县的情况更为严重。在编职工长期病事假的人员最多，占到总数的38.9%；其次是到龄未办理退休手续人员，占到总数的15.7%。

浙江省永康市曾经对“吃空饷”人员进行自查自纠，清理的192名人员，涉及教育、卫生、交通等几十个部门，其中教育系统人员达88名，占到45%。

等等，等等。在中纪委网站上可以查出来非常多的例证。

另外，从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也就是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

 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也就是夫妻双方中有一个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也就是不论夫妻是否是独生子女，所有的夫妻都可以生二胎。

但是根据笔者对周边人群的观察，周围绝大部分生育二胎的夫妻，都是体制内人员，妻子一方体制内人员的生二胎的比例，要远远的高于妻子一方在体制外的人员。

笔者询问过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内的人员的产假有保障，生育对体制内工作的位置没有影响。而体制内的男性工作人员，经常要被迫接受去生孩子的女性同志的工作。基层单位的小领导，经常因为属下女性工作人员接二连三的因为产检、产假等原因无法安排工作。

笔者听过某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北京某个机关招募工作人员，考进来的一个女生，刚刚进入正式工作没几个月，就结婚，开始休婚假。婚假之后没多久，报告怀孕，开始休产假。产假结束之后，不到半年，再次怀孕，开始第二次休产假。结果这个女性公务员进入单位工作三年之内，正式的工作时间不到一年。

而体制外的大量育龄女性，产假，婚检都无法保障。用人单位也竭力避免雇佣近期会结婚，生孩子的女性。

所以体制外女性的生育权利与体制内女性的生育权利差别巨大。而体制内女性的生育成本，实际上是由全民提供的。

这样就进一步的拉大了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财政供养比例。

现实的情况就是**“食之者众，生之者寡”**。

## 人口数据的投资参考功能失效。

众所周知的事情是当前众多商业实体，进行各种商业活动的时候前期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

比如宜家（IKEA）家居，他们开设实体商场的依据之一就是在一座五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开设一家商场。人口数达不到五百万以上，的城市不会投资开设实体商场。

其他的商业行为，比如餐饮、健身房、服装店等等，所在城市的人口总数与人口结构是这些商业行为能够保证拥有足够的客流的先决保证。

现在七普数据没有正式出台，假如七普数据正式出台，数值更接近于易富贤的最大12.83亿人口，而不是更接近国家统计局的14亿人口。这将直接影响到商业机构在中国的投资策划。

人口总量会影响商业机构的投资行为，因为这个涉及市场的总规模。人口结构同样会影响商业机构的投资行为，因为这个涉及到市场的结构。

比如中国的汽车市场，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市场现在一片火爆。恒大、华为、百度、小米、吉利等等多家传统汽车厂商、互联网企业甚至房地产开发商都投资其中。但是笔者对这些厂家的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技术方面的原因笔者以前在其他文章里讲过，这里不重复。市场上的原因则是，中国未来的汽车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注定要萎缩的市场。伴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国内人民对私家汽车的需求，实际上已经迈过了一个顶峰了。

中国未来的私家汽车市场，注定是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市场。

阿里巴巴曾经有过一个统计，就是在淘宝上消费量最大的一个群体是中国的六零后。今天中国的六零后人群，年纪最大的已经61岁，已经步入退休年龄。年龄最小的六零后已经52岁，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准备退休的年龄。

根据国际上一般公认的商业规律，退休后的人群消费能力将会快速下降。也就是说，前几年在淘宝消费能力最强的一个群体，已经开始进入了消费萎缩的阶段。

可以预见的是，在国内政治、经济、分配制度维系当前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最有能力消费的一个年龄层，其消费能力将会急转直下。

在央行的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中提到要“**重视储蓄和投资，首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储蓄率过快下降的趋势，其次要认清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

与之相对的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4月25日在2021年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顺应当前消费需求，抓住春夏时节消费旺季，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加速市场回暖、促进消费稳中提质，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于近期组织开展2021年全国消费促进月系列活动。

在以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激发市场活力，加速市场回暖。依然保持了强大的行政惯性。

可以预见的是，今天中国的消费市场实际上是出在一个饱和，甚至是超饱和的情况下。而且伴随着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中国的消费市场会进一步的萎缩。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所有的消费领域都会被杀成一片血海。

随后会发生惨烈的商业社会达尔文现象：不能适应中国的老龄化社会的商业群体倒闭、退出市场。整个消费市场被高度垄断化，集中化的趋势愈演愈烈。

商务部最近搞的这个消费促进月的活动，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政府财政压力巨大。而中国的政府收入里的一大块，是流通税。所以，只有在促进消费的情况下。政府才收取更多的流通税。

但是，根据易富贤对中国人口总量的估算以及对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预判，今年商务部搞的消费促进月，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而伴随着的，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台之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者对于中国人口总量以及人口结构的认识明确时候，必然会对中国消费市场的投资转向保守态度。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的旋涡里去。

对七普数据最敏感的应该就是房地产市场。

假如统计出来的真实数据更偏向易富贤的最大12.83亿人口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住房面积39平方米（2019年统计数据）也要进行重新审视。

房地产发展到现在，已经脱离了住宅使用的属性，已经完全背离了当初“房住不炒”批示。可见中国的地方政府已经完全失控。

这里需要吐槽一下的是那些认为党的一切行为都是伟光正的人，在2016年房价暴涨的时候喊出来的口号是“涨价去库存”。但是四年时间过去了，国内的房产库存不仅没有去库存，反而持续增长。

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深房通事件，大量的参与者是深圳市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四月份学习与拜登参加世界气候峰会之前，中央三番五次点名深房通，深圳市政府三番五次自查说没问题。在气候峰会之后，中央派人直接更换深圳市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等等一系列操作。可以想象的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威极度下降。

可见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下降到了一个节点。

学习在政府人员当中的威望也几乎是零了。

七普数据对房地产领域的冲击，除了总量上的冲击之外，还有一个人口结构上的冲击。众所周知的是老年人的活动范围有限，老年人的住宅需求并不要求面积上的数量，而是对配套设施有更高的要求。而当下的房地产行业的现状，以及房地产从业的实体对于中国当下人口结构的判断是失准的。

而且现在中国众多房地产开发企业大量的通过海外市场进行融资作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判断，是持续为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融资的首要依据。可以预想的是，七普数据的出台，将会给现在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狠狠地泼上一瓢冷水。被浇醒的人，除了国内各个地方的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国内各种金融机构、最重要的是国外各路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资产阶级。

抽回资本，停止永续债，降低对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很可能成为压垮房地产企业的稻草。

## 人口普查数据对国家安全影响。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国安全的影响，可以分为内部、外部视角两部分来看。

从内部视角来看，易富贤的人口数据如果计算准确的话，将会极大地冲击国内民众对于军队征兵需求的心理。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当中，解放军的征兵需求连续几次放宽，说明民间中能够满足解放军征兵需求的青年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众所周知，中国对周边国家军事上的一大震慑，力量，就是中国的足够庞大的青年人口的基础上，存在者海量的合格兵员。兵员的数量是中国军事力量最重要的基础性力量之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兵员数量的震慑力量将会逐渐萎缩。必然要重新调整国防策略。

七普数据的出台，必然会对中国的国防策略，产生巨大的冲击。

而且现在中国独生子女多，大量的兵员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从军，出现伤亡，将直接冲击社会最基础的细胞：家庭。实际上，在2013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

这一千万个失独家庭未来的生存、养老等等都会成为影响社会的巨大问题。而对于奋战在国家安全第一线的独生子女军人来说。每一个军人的牺牲，都会带来整个家庭的完全破碎。而对于承担着军人烈属抚恤工作的地方政府来说。

每一个独生子女军人的殉国，都意味着巨大的抚恤压力。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可能不影响到前线军人的战斗精神。

从外部视角来看，中国无法通过庞大的高素质兵员来保持对周边一票小国家的军事震慑，必然会改变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中国周边一票国家，因为人口比例以及人口结构的此消彼长，军事上对中国的信心局面就会扭转。

特别是印度，在央行的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中，专门提到了中国与印度、美国之间的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对比。

与中国当下的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相比较，印度的人口结构更年轻，印度的人口数量超过中国是肯定的。而从国际资本的角度来讲，印度的年轻人口比中国的年轻人口更具有剥削潜力和消费潜力。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西方的一些大的服装企业，比如H&M、耐克、优衣库等等开始抵制中国的新疆棉花，这背后的根本动机就在于，已经起来了将这些企业在中国现有的纺织、成衣制造产业，转移到印度的心思。

笔者对此专门撰文论述过：《棉花、纺织品、成衣制造以及资本主义》，这里不多说。

但是这种产业转移，在今天印度内部开始大选的同时，因为新冠病毒在印度制造了大量的人员死亡的情况下被阻碍。印度可能通过军事冒险的方法，加剧与中国的对抗，对内进一步唤起印度民族主义，对外打击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同时给国际资本吃下一个定心丸，推动国际资本从中国抽离，重新注入印度的过程。

简而言之，一旦中国公布了七普数据，并且七普数据更接近易富贤所估算的12.83亿人的最大值的话，将会极大的增高中印之间的战争风险。

如果中国在与印度的军事斗争中不能获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中国现在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将会是空前的。

## 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比例变化，带来的内部冲击

七普数据里，很重要的一个数据结构，就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人口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之间的比例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是持有双轨制的。少数民族不仅仅在生育上高汉族一等，并且在高考的时候还可以凭借少数民族身份加分数。

国内经常有人嘲讽美国的身份政治，实际上中国的身份政治比美国的更严重。

2020年7月浙江大学爆出来的哈萨克族学生努某某强奸女同学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学校对其的处罚，最初仅仅是留校察看，在公开之后，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开除学籍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身份政治在中国的一种具体体现。

这种司法上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身份政治。努某某背后是少数民族党内势力。

笔者观察了很多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恋爱和通婚的案例，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多数极力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的少数民族一方面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人员，党员、教师、公务员等等。

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父母们，他们成为党员，并不是因为他们认同党的理念，而是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

他们成为教师，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有什么优势，而是因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

他们成为公务员，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忠诚，而是因为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

按常理来说，最应该对法律、婚姻恋爱自由熟悉、接受过党的教育的这些人，按理说应该是较为明智的，对民族融合、子女恋爱持开放态度的。即便是不同意，也不应该把民族宗教因素作为唯一衡量因素。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作出和极端者一样的动作：跟汉族就恋爱结婚，就是不行。

根源在于，他们通过少数民族的身份，获得了党员、教师、公务员的身份之后，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想要维持这种好处，就必须加强自身的少数民族身份。

越是能够加强身上的少数民族身份印记，就越是能够通过党、教育系统、政府系统获得好处。

从这个现象来看，所谓的两面人绝对不仅仅是上层的几个大老虎，而是普遍存在于体制内的。

至于在笔者从小到现在的经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后生孩子，也往往把孩子的民族成分设定为少数民族。同样是政策上对少数民族倾斜带来的利益驱动所致。

我们不能忘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而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就是苏共的民族政策所一手打造出来的。

1991年9月6日，即在苏联发生八一九事件不久，苏联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依靠武力推翻了当地的苏维埃政权。10月，车臣举行共和国总统和议会选举，杜达耶夫当选总统。11月，即在苏联解体的前夕，杜达耶夫颁令成立“主权国家”车臣共和国，并很快组织了车臣国民卫队。

而发起车臣战争的车臣人首领杜达耶夫，就是苏军空军少将。是苏联体制内催生出来的极端民族分子

和很多人想得不一样：**并不是苏联解体后，苏联内部的民族矛盾爆发，导致的车臣叛乱发生。而是杜达耶夫这样的苏联体制内少数民族军人，通过搞车臣叛乱，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归根到底，就是苏联内部的少数民族上层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背叛了共产党地理想，推动民族独立，间接推动了苏联的解体。

做共产党的干部哪里有做国家元首来的爽？

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内部的生育率过低。六十年代苏联生育率就掉到只有2多一点。这2多一点儿的生育率还是靠各种少数民族生育率极高拉上去的。

伴随着苏共高级干部、苏联政府高级官僚的日益资产阶级化，苏联的民族政策，并没有能够形成共产主义信仰的强大凝聚力，来团结各个少数民族，反而在不断地搞身份政治，人工制造了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到最后少数民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利用民族认同，裹挟了整个少数民族分裂国家。将苏联推上了解体的道路。

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 结论。

易富贤的论文里，只聚焦了中国的总人口问题，对于中国的人口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结论是：**2020 年中国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只有 12.55 亿，不可能超过 12.83 亿，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危机。**

而笔者的结论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迟迟不公布，恐怕真正的原因就是会对当下政权合法性产生冲击。

在可能会引发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的同时，刺激国内分裂势力的野心。

还有可能引发中国的消费萎缩局面的同时，引发中国的外资产业抽离。

简而言之，很有可能会引发中国内部的经济矛盾、上层与下层的阶级矛盾、政权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

再简单地说，就是会引发中国的上层建筑与支撑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双重崩溃。

这次七普数据，对中国整个社会的冲击，将会是全面的。

赫广达

于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